

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与乾隆帝的宗教心态

孔令伟

内容摘要：受到藏传佛教观念的影响，乾隆帝再三自诩为文殊菩萨转世，不仅下令内府在所制唐卡中将其本人描绘成文殊菩萨，更授意文臣通过编纂《满洲源流考》来建构“满洲”（Manju）等同于“曼殊师利”（Mañjuśrī）的考据政治学。对于乾隆帝钟情于藏传佛教的特殊现象，过去有清史学者根据乾隆帝所作《喇嘛说》，认为其个人对佛教的态度，不过是“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统治工具，本文试图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乾隆帝所用之右旋白螺为例，结合相关汉、藏、满、蒙文题记与相关档案史料，对以上观点进行商榷。通过考察清宫旧藏之右旋白螺及其所附密咒与铭文等文本，本文指出乾隆帝不仅有大量收集密教法器的喜好，并利用右旋白螺修习《时轮金刚续》《大威德金刚续》等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的甚深密法。由于密法修习的保密性，本文认为乾隆帝内心世界中的藏传佛教信仰并不宜机械地理解为笼络蒙古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对清宫旧藏密教法器与多语文献的“文/物”二元互证，亦可补充清朝官书与档案史料之不足，进而将过去清廷与西藏地方关系研究从政治史延伸至文化史、宗教史等多元范畴。

一、前言

随着清代档案与器物史料的开放，研究者得以逐步发掘清朝的多元面向。如清朝皇帝一方面在汉人臣民面前强调儒家道统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在满、蒙、藏、疆等地却又以可汗的形象现身¹。与此同时，由于清代满、蒙、藏地之间复杂的政教关系，清朝皇帝甚至频繁以佛教转轮王乃至佛菩萨自居²。清朝皇帝的多重面貌，体现了清朝统治的多元与复杂性，并非单纯的汉化论或者内亚性一方所能完全涵盖；至于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亦非单纯的统治工具所能解释，实际上牵涉更为深层的文化与心态史层面。然而由于佛教密宗自身的秘密性，以及清代官修史书的政治语境，使得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往往被片面化为统治意涵。然而通过考察清代宫廷的佛教法器，可以发现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渊源，并不只停留在单纯的政治工具，而是有着相对深入的宗教认识；其中乾隆帝对佛教密宗的修习以及相关法器的收藏，更体现出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间复杂的权力话语以及文化心态，值得进一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深入分析。

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认识，主要源自十七世纪初满洲与蒙古之间的密切交流。通过与蒙古各部的接触，满洲人渐渐吸收藏传佛教特殊的政教观念。随着十六世纪末以降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蒙藏僧人开始在蒙古宣传并重塑一种独特的“政教二道”理论，即蒙古汗王通过与藏地高僧建立檀越关系，以获得佛教超越性的普世认可。1578年，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བསོད་ནམས་བླ་མཚོ། 1543-1588年）在青海会面，将二者建构为忽必烈与八思巴转世，以此作为蒙藏关系的基础。而托名为元世祖忽必烈所造的蒙古文史籍《十善法白史》（*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n teüke*），也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³。随着十七世纪上半叶满蒙关系的进展，这种“政教二道”（*törö šajin*）理论，也进入满洲统治者的视野，由此进一步影响了清朝皇帝的文化心理乃至清朝政权的多元性质。

由此可见，要深入比较研究清朝统治的多元性，理解清朝皇帝的文化心理及其政教观念十分关键，而物质文化与心态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深化该议题的讨论。传统的实

1 Evelyn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97-201.

2 David Farqu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1 (1978): 5-34. 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2011。

3 乌云毕力格、孔令伟：《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民族研究》2016（2）：85-97。

证史学倡导所谓的“客观性”（objectivity）之故，多半倚重文字材料，而将研究器物与视觉材料划为艺术史与考古学的范畴。然而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奠基者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业已提出借由雕塑、音乐等艺术性材料探讨情绪、感官等主观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⁴。直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更是将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的研究推向顶峰，使之成为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中流砥柱⁵。费夫尔与勒高夫的研究特点在于，二者皆重视宗教史研究，并强调将宗教实践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脉络中来理解。如费夫尔笔下的马丁路德与勒高夫所讨论基督教“炼狱”概念的形成，便是心态史研究最典型的例子⁶。近年来，美国学者也试图结合绘画、雕塑等视觉材料，重新探索清朝仪式实践与权力结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其中又以白瑞霞（Patricia Berger）与司徒安（Angela Zito）的成果具代表意义⁷。受到这个研究思路的启发，本文从物质文化的视角，通过考察清宫旧藏之藏传佛教法器，将清朝皇帝的宗教实践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而深入到心态史研究的场域，尤其重点探讨清朝皇帝对佛教密宗的认知与实践。

二、佛像、唐卡以及清朝前期的正统叙事

清朝政权的建立，一方面强调中原正朔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蒙元遗产的继承性。清朝对中原与蒙元正统的继承，亦直接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在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正式建立清朝以前，满洲人曾从林丹汗处得到所谓秦朝“传国玉玺”。⁸除了象征中原正朔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击败林丹汗后所得到的另一个至宝——摩诃葛刺金佛像。所谓摩诃葛刺（Mahākāla），亦称为大黑天，原为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供奉的护法神。由于十三世纪元朝帝室对萨迦派的崇敬，大黑天遂成为蒙古统治者心中的军神与政权守护者。根据《佛祖历代通载》，当蒙古骑兵南下征讨襄阳时，摩诃葛刺曾大显威灵，使

4 Lucien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London: Routledge, 1973: 12-26.

5 Jacques Le Goff, “Les 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ambiguë,” *Faire de l’histoire III*, eds. J. Le Goff & P. Nora, Paris, Gallimard, 1974: 76-94. Jacques Le Goff, *La naissance du Purgatoire*, Paris: Gallimard, 1981.

6 Lucien Febvre, *Un destin: Martin Luther*, Paris: Reider, 1928.

7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8 何启龙：《蒙元和满清的‘传国玉玺’神话：兼论佛教‘二教之门’的虚构历史》，《新史学》2008（19.1）：1-50。

蒙古人顺利拿下襄阳城⁹。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与蒙元建国的历史叙述，紧密相关。无论这段传说是否确有其事，大黑天自十三世纪中期以后，确已成为元帝国的重要正统象征。根据藏文史书《汉藏史籍》(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元朝帝师八思巴曾命尼泊尔巧匠阿尼哥(ཨ་ནི་ཁ་དགའ་)于涿州修建大黑天(མནུ་ཀུ་ལ་)塑像，以此安定天下¹⁰。

相传八思巴曾命阿尼哥在五台山修造一尊大黑天金像，并在西行途中将金像带回萨迦寺。当十七世纪初萨迦派僧人沙玛尔巴东来与察哈尔林丹汗结成施供关系时，曾带来一金佛，并宣称此为八思巴当年所造之大黑天金像，以此作为林丹汗继承蒙元正统的象征。无论其真实来历为何，这尊大黑天金像无疑为林丹汗政权提供了坚固的正统性基础。而这也正是皇太极何以在林丹汗于1634年败死后，极力寻找金佛下落的原因。而这尊金佛，也就是日后盛名远播的盛京实胜寺大黑天金像(图一)。根据满文《内国史院档》《实胜寺碑》以及《清太宗实录》记载，林丹汗死后其部署将大黑天金像献予皇太极。皇太极于是下令在盛京(今沈阳)兴建实胜寺以供奉金佛¹¹。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内阁大库档》一组1635年皇太极与朝鲜国王李倧(1623—1649年间在位)之间往来的满文信件中，曾经涉及关于大黑天金佛与清朝初年正统话语建构的相关史实。皇太极在这封信中，声称他已从蒙古人手中获取八思巴所造之大黑天金像，要求朝鲜国王送来稀有的彩绘颜料，以便建寺供奉¹²。而朝鲜国王在回信中提道：“贵国修建佛寺，又得大元佛尊，此天以慈悲之教福贵国之人也。”¹³由此看来，大黑天金像所代表的正统性，并不仅仅为蒙藏人士所承认，即便在当时朝鲜半岛等曾受蒙古和元朝所统治的东北亚地区，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在皇太极从林丹汗处获得大黑天金像不久后，便于1636年宣布建号大清，改元崇德。这也说明清朝的成立最初所依据的正统观念，主要是来自蒙元所宣称的藏传佛教法统；一直要到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清朝才正式接受明朝所代表的儒家道统。

除了藏传佛教塑像外，清宫收藏的佛教绘画与唐卡也充分反映了清代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清帝信仰佛教一事，尤其是顺治、雍正与乾隆三帝，早已广为人知。有趣的是，雍正帝除了是一位虔诚的禅宗居士，对于藏传佛教也有所涉猎。在《胤禛行乐图册》中，

9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收入《大正藏》第49册：725-727。

10 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 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 འྲིང་ཏུ་ལ། 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5: 281.

11 李勤璞：《盛京嘛哈噶喇考证——满洲喇嘛教研究之一》，《藏学研究论集》(7)，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95-117。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天聪9年7月25日，档号：167443-001。这份满文档案在《清实录》第2册中有相应的记录，见《清太宗实录》第2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314。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天聪9年9月9日，档号：038136-001。



图一 盛京实胜寺大黑天像，内藤湖南 1908 年摄¹⁴。1946 年大黑天像离奇被盗，自此下落不明。2016 年 1 月，在信众发心重塑金佛的善举之下，大黑天金身又重现于实胜寺内。

雍正帝不仅曾以儒者、道士以及西洋猎人的形象粉墨登场，更曾身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僧衣，以喇嘛的姿态现身（图二）¹⁵。根据《景德传灯录》与《传法正宗记》等禅宗典籍，可以确定雍正身着喇嘛装的绘画主题，源自迦毗摩罗尊者（Kapimāla）度化大蟒的故事¹⁶。尽管绘画的母题源自汉地禅宗，雍正帝本人却以一位藏传佛教修行者的形象出现，这多少反映出雍正帝汉藏交融而又独特的宗教认同。

相较于雍正帝，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因缘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京紫禁城、雍和宫乃至拉萨布达拉宫等地，藏有多幅乾隆帝佛装像。其中一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佛装唐卡中，有藏文偈颂道曰：“敏捷文殊化人主，游戏大圣为教王；金刚宝座

14 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1935：90。

15 故宫博物院藏：《胤禛行乐图册·喇嘛装页》，图版见故宫博物院网页：<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1806.html>（2020/6/13）

16 《景德传灯录》卷 1，收入《大正藏》第 51 册：209。《传法正宗记》第 3 卷，收入《大正藏》第 51 册：726。



图二 雍正佛装像（图片出处见注释 15）



图三 乾隆佛装像（图片出处见注释 17）

上长驻，任运指愿善缘法。”（འཇམ་དཔལ་རྣོན་པོ་མིའི་ཇི་བོར། རོལ་པའི་བདག་ཆེན་ཚས་ཀྱི་རྒྱལ། རྫོག་ཇིའི་ཁྲི་ལ་
ཞབས་བརྟན་ཅིང་། བཞིན་དོན་ལྷུན་གྲུབ་སྐལ་བ་བཟང་།）¹⁷ 此处被称为人主的敏捷文殊，正是被视为文殊皇帝的乾隆本人；而所谓的游戏大圣，指的正是乾隆帝的宗教导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རོལ་པའི་རྫོག་ཇི། 藏文意为游戏金刚，1717-1786年）。而藏文偈颂中政教观念结合的叙述，亦体现在唐卡的构图结构。如乾隆帝在唐卡中身着僧衣，头戴佛冠，手持法轮；头顶上除了诸佛菩萨与历代祖师，正上方有一位格鲁派僧人，即是乾隆本人的上师章嘉呼图克图（图三）。

细究乾隆佛装唐卡的实践脉络，可以发现这些视觉形象的创作具有复杂的政治与宗教脉络。通过实地考察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གཟིམས་རྒྱང་ས་གསུམ་རྣམ་རྒྱལ།）以及扎什伦布寺汉地佛堂（རྒྱ་ནག་ལྷ་ཁང་）的陈设，可以发现康熙、乾隆等清帝佛装唐卡往往与所谓的皇帝万岁牌一同供奉。这种从右至左以藏、汉、满、蒙四体文字所书写的皇帝万岁牌，与明代以降所流行的民间宝卷中的皇帝万岁牌图像，具有形制上的延续。这种皇帝万岁牌

17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88-89。

在清代内地以及台湾地方的庙宇、祠堂中，也曾作为皇权的延伸而被大量供奉¹⁸。由此可见，清帝佛装唐卡与四体皇帝万岁牌，曾作为清代皇权的延伸而进入布达拉宫与扎什伦布寺等西藏主要寺院中，从而体现出政教二者在观念以及实践上的结合。

乾隆佛装唐卡中将皇帝视为文殊菩萨化身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国家的正统论述。如清廷文臣所编纂的《钦定满洲源流考》，依据乾隆帝的意志，试图以考据学将满洲与文殊进行词源学上的勘同¹⁹。这种为论证正统观念服务的学术工作，虽然缺乏语文学的实证依据，却反映出清朝特殊的政教思想。然而将文殊与满洲勘同的说法，并非乾隆本人的创造。自1652年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དགེ་འཕེན་ལྷོ་བཟང་གྱུ་མཚོ། 1617-1682年）在北京南苑郊外会面后，顺治帝为达赖册封尊号，达赖亦为顺治上文殊皇帝（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ང་མ།）的尊号²⁰。然而顺治帝并不是第一位被视作文殊转世的皇帝，早在三百年前，大元帝师八思巴就已经认定元世祖忽必烈为文殊菩萨转世，因此后世藏文史籍往往将汉地的统治者视为文殊菩萨化身²¹。五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将顺治帝视作文殊菩萨转世，也正是因为清朝接受了蒙元以来蒙藏佛教的政教二道观念。

三、右旋白螺、平定台湾以及乾隆的密法修行

除了佛像与唐卡外，清代宫廷内亦藏有诸如白海螺与嘎巴拉碗等大量藏传佛教法器。这些藏传佛教文物与清代政治以及清朝皇帝本人的宗教观念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在今日两岸故宫博物院中，藏有相当数量之藏传佛教法螺。在清宫旧藏诸多白螺中，有多件涉及清代重要史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西（ལྷོ་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ཡེ་ཤེས། 1738-1780年）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为祝贺乾隆帝七十岁寿诞，期间曾献上镶嵌有珉琅与宝石的海螺。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这颗右旋白螺于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太监厄鲁里转交内府，配得鞞皮画金匣后，交宁寿宫保管²²。皮匣内的汉、蒙、满、藏四体题记称收有“利益珉琅镶嵌海螺一件”（藏文 ཤེལ་ཅི་རྒྱན་ལྷན་དུང་ཆ་གཅིག་གྱིན་ཅན་ 满文 adistid bisirere falasu i kiyamnaha buren emke 蒙古文 adistid-tu temür-iyer

18 濮文起：《民间宝卷》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374。李文良：《立大清旗，奉万岁牌：朱一贵事件时的「皇上万岁圣旨牌」》，《台湾史研究》2012（19.2）：1-29。

19 于敏中、阿桂纂：《钦定满洲源流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20 བོད་ལྗོངས་ཡིག་ཚགས་ཁང་། བོད་ཀྱི་ཡིག་ཚགས་རྒྱགས་བསྐྱེད་ལུ་ལེ་ཅིང་། གུ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དཔེ་ལྷན་ཁང་། 1997: 45.

21 Herbert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Aldershot: Variorum, 1994: 52-79.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302。



图四 故宫博物院藏海螺（图片出处见注释 23）

sigidkegsen labai nige), 这件白螺今藏北京故宫(图四)²³。从造办处的纪录看来, 这件法螺所镶嵌的珉琅与宝石, 应是西藏方面进呈前已经完成, 并非内府后来所加工。由此可见, 这件由六世班禅喇嘛献给乾隆帝的法螺, 不仅见证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友好关系,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喜马拉雅地区珉琅与镶嵌工艺技术水平之精湛。

在加工水平之外, 藏传佛教法螺的形制, 以白色且右旋为稀罕而尊贵, 因此达到这类特殊要求的法螺, 在清代汉藏文献中又多以“右旋白螺”(དུང་དཀར་གཡམ་འབྲིལ) 名之。

23 故宫博物院、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扎什伦布寺编：《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248-251。



图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旋白螺（图片出处见注释 25）

清代蒙古文人工布查布（蒙 Gümüjáb 藏 མགོན་པོ་རྒྱལ་བ་）在《造像量度经续补》中对此曾作注解：“右旋白螺，身质右旋，其衽则反回左转。按螺虫骨身，通是左旋，而衽回右转。今番僧寺庙，为乐器用者即是，谓之凡螺，亦谓逆转螺，不为贵。传云：螺身辄转生螺，连转五次者，即变右旋螺，谓之仙螺，亦谓顺运螺。在处大有吉祥，世间甚为罕有。”²⁴ 佛教所谓的右旋海螺，是指将螺嘴朝上时，螺纹由外壳至螺心为顺时针右旋；故螺嘴朝下时，螺壳开口位于右侧。与当代生物学由螺心至外壳的观测定义方向相反。

清代右旋白螺不仅具有文物价值，不少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清朝皇帝个人的宗教心态，右旋白螺在清代不仅曾作为皇帝个人修行佛教密宗的法器，更曾被视为航海用的定风珠，出借给往来于闽台两地的官员以及前往琉球的使臣。在清宫旧藏的右旋白螺中，尤以今分藏台北、北京故宫的两件藏品深具历史意义。通过结合清代档案，可以通过这两件右旋白螺进一步探讨藏传佛教物质文化与清朝皇帝的宗教心态。

第一件右旋白螺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五），长 18.9 公分，宽 9.4 公分，螺体镶

24 工布查布：《造像度量经续补》，《大正藏》第 21 册：946。

有鎏金吹口以及庄严护板。吹口镶有珊瑚、青金石，并饰以仰覆莲瓣以及如意云纹。护板钉接于螺口与底端，护板为金面银里。金面中心铸有藏文梵咒，外缘镶有绿松石、青金石以及珊瑚等各色宝石，并饰有缠枝花纹以及大小线，托底刻有“乾隆年制”汉文款识。银面内里则阴刻藏文梵咒，并刻有“大清乾隆年制”四体题记。这件右旋海螺藏于内府所造鞞皮画金匣内，匣盖内缘贴有四体签条说明其来历外，匣内并附有分别以藏文、汉文以及满文阿哩嘎哩字书写之六份签条。其中一份内府所附之黄色签条，注明其重量与镶金成色为“五成金、连镶嵌共重九十八两”²⁵。

根据内府所制皮匣内的四体题记，可知其在清代被定名为“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藏文 $\text{འཇམ་མཐོག་གི་རྩེ་དཀར་གཡས་འབྱེད་ལྷོ་ཆེ་བ}$ 满文 $\text{amba adistid bisire wesihun sain sabingga ijishün i šurdere šanyan buren}$ 蒙古文 $\text{yeke adistid-tu sayin öljei-dü jöbsiyerkü ergigsen čayan labai}$ ）。对比四体名称，可知汉文“右旋白螺”之称系译自藏文；而满蒙文译文则理解为“顺运螺”，与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经续补》所提别名相同。此外，据内府四体题记称：“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赐福康安（ ལུ་ཁང་ལྷན ）带赴台湾（ ཐའེ་ལན ），剿平逆贼林爽文（ ལིན་གུང་ལེན ）、庄大田（ རྩང་ཏ་ཐེང ）等，往来渡海平安。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凯旋后，缴回供奉，永资护佑，普被吉祥”。此外，匣内尚有一墨书抄录之签条，内称：“右旋螺，俗称定风珠。查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十四日，上谕云：（上略）从前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时，曾携带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往来渡海，风帆平顺。兹亦发交赛冲阿敬诚祇领，带往渡洋，以资护佑，俟事竣凯旋之日，派大员赉送回京，缴进供奉。”这份签条抄录的嘉庆上谕所载日期有误，实际上出自嘉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这段文字均收录于《上谕档》以及《清实录》中²⁶。由这两份签条的题记内容可以得知，清廷于乾隆、嘉庆年间发兵台湾平定林爽文以及蔡牵之乱时，曾两度出借这件右旋白螺予身为领兵将领的福康安以及赛冲阿，用以坐镇船只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关于这件右旋白螺与乾嘉年间平台战事之渊源，前人有简要介绍²⁷，然而关于其制作来历以及与清朝皇帝之宗教认识等方面，则有待进一步阐发。

关于这件曾两度涉及平台战事的右旋白螺，《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详细记载了其制作经历。这件右旋白螺最初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二十一日由太监胡世杰呈交，并附有四件折片。乾隆帝随即下旨将折片一并“交阿嘉胡图克图，将海螺认看左旋右旋”。

25 蔡玫芬：《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150-151。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清实录》第30册，《仁宗实录（三）》卷156，1986：3-4。

27 赖依纒：《人间奇宝——福康安携台白螺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011（343）：110-115。

随后内务府造办处大器作郎中白世秀与员外郎金辉遵旨将白螺镶金边，并预先将样纸图式由太监胡世杰进呈御览。按照乾隆的旨意，“周围照样准做，金面银里，其心子要素的。着阿嘉胡图克图拟咒语。底托要乾隆年制。”同年五月十九日，金辉将半成品呈交御览，乾隆帝复命“将咒语刻在外面，周围起大小绿”。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内府将这件右旋白螺配得鞞皮画金盒一同进呈御览，乾隆帝又命“着在银里上刻大清乾隆年造。俟认看写四样字签子贴在盒盖内。”这件右旋白螺最终在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完工进讫²⁸。根据这份档案的记载，可知该件右旋白螺护板上的咒语铭文，系由二世阿嘉呼图克图阿嘉·罗桑丹贝坚赞（ཨ་ལྷ་སློ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བྱུང་མཚན། 1708-1768年）所定。

考察右旋白螺护板两面上的咒语铭文，可以发现金面所铸语，录文为：“ཏུ་གྲུ། རྣམ་ཤི། ལམ་ཉི་མེ་ལུ་ཉི། ར་ཤ་མ་ལི། མི་ས་མི་ཏ་ན་ལི། ལྷ་བརྟུ་ས་ལྷ་སྒྲ། ལམ་མཁ་ལོ།”此咒系出自《一切成就陀罗尼》（དོན་ཐམས་ཅད་འགྲུབ་པའི་གནུངས།），收入《甘珠尔·陀罗尼集》（བཀའ་འགྲུས། གནུངས་འདུས།）²⁹。至于护板银里所铸之梵藏双语密咒，应属格鲁派时轮金刚续之不共口传，不着文字，一般显宗文献中罕有提及。笔者见识有限，唯谨据此右旋海螺银质护板内侧开头梵咒“ཨྱ་བཟླ་རྩ་པ་རྩི།”并参照目前格鲁派已公开出版之时轮灌顶仪轨，可知此咒应属实修时轮灌顶时，右手持右旋白螺所念诵之对应咒语³⁰。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这件右旋海螺共同收藏在皮盒的签条中，除了有两首乾隆帝御制的右旋白螺赞诗外，尚有三份以藏文抄写的藏文梵咒。其中两份书于白色签条的咒语，分别对应白螺护板内外侧之《一切成就陀罗尼》以及《时轮金刚咒》。其中写有《一切成就陀罗尼》的签条，除了护板金面外侧的咒文本本身，并在句尾额外加上“ཨྱ་བཟླ་རྩ་པ་རྩི།”，且在结尾以满文注明此咒名称。这份签条不仅显示出此件右旋海螺上铸铭之《一切成就陀罗尼》与时轮灌顶具有关联性，上头的满文注解更反映出乾隆帝本人曾使用此件右旋白螺进行秘法实修。又另一件黄色签条上，亦书有大威德金刚（ཡ་མཚན་ཀྱ།）藏文梵咒，并以满文阿哩嘎哩字注音，这应该也是乾隆为了便于修习密法时诵读咒语所作的笔记。由此可见，乾隆与嘉庆帝之所以在两次平台战中出借此项宝物给清军将领，并认为其有定风珠之功效，与乾隆本人曾使用此件右旋白螺实修《时轮金刚续》以及《大威德金刚续》等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甚深密法有直接关系。至于乾隆通过右旋白螺所修习的密法传承，很可能与决定铭刻咒语的二世阿嘉呼图克图有关。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27-228。

29 བཀའ་འགྲུས། རྩི་དགོ་པར་ལུས། 101 བཅུ། 184 (368)

30 Jeffrey Hopkins trans. *Kalachakra Tantra: Rite of Initiatio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9: 336.

四、右旋白螺与清代藏传佛教在海疆事务中的实践

除了乾嘉年间两次平台战事外，右旋白螺与清代海疆事务的日常经营亦颇有因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在平定林爽文与蔡牵之役后收缴大内，然而此后由于清朝海疆官员以及使臣往来于福建、台湾、琉球间的航海需求，清廷曾另外赐寄一件六世班禅喇嘛所赠的右旋白螺，存于闽浙总督衙署内，以供官员往来闽台等地间航海之用。这件右旋白螺，系六世班禅喇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贺乾隆帝七十岁寿诞期间所进，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实物长10.8厘米，无装饰，所藏皮盒内侧四体签条称“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思议功德。”（图六）³¹根据《内阁大库档》《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实录》等记载，福康安在缴回那件镶金的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后，乾隆五十三年底（1788年）清廷又曾寄发这件无装饰的右旋白螺给福康安，令其存放闽浙总督衙门内。如《清实录》称：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福康安前赴台湾，特赏给右旋白螺带往，是以渡洋迅速，风静波恬，咸臻稳顺。今思闽省总督将军巡抚提督等，每年应轮往台湾巡查一次，来往重洋均资灵佑，特将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右旋白螺发交福康安，于督署洁净处敬谨供奉。每年督抚、将军、提督等，不拘何员赴台湾时，即令带往渡海，俾资护佑，俟差竣内渡，仍缴回督署供奉。至前往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险轻涉，总视风色顺利时，再行放洋，以期平稳。将此谕令知之³²

又根据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奏折，可以得知这件六世班禅喇嘛所赠的右旋白螺，存放在闽浙总督衙署内的相关情况：

奴才当即会同魁纶、徐嗣曾出郊跪接圣谕，迎奉白螺入城，奴才福康安督署第五层系楼房，高敞洁净，复加拂拭洒扫，将白螺敬谨安龕供奉。³³

31 故宫博物院、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扎什伦布寺编：《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260-261。

32 《清实录》第25册，《高宗实录（一七）》卷1317，1986：799-800。

3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4：138。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宫中档奏摺》，编号：039437。



图六 故宫博物院藏右旋白螺（图片出处见注释 31）

这件在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存放在闽浙总督衙门的右旋白螺，曾多次出借清朝官员出航前往琉球、台湾等地使用。嘉庆五年（1800年）清朝使臣赵文楷（1761-1808年）、李鼎元（1750-1805年）奉命出使琉球，时任闽浙总督玉德曾奏称：

臣恭查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前赴台湾征剿林爽文时，曾蒙高宗纯皇帝颁赐班禅所进右旋白螺，往来供奉船中，风静波恬，渡洋极为平稳。现在白螺敬谨供奉臣署内，今使臣赵文楷等远赴琉球，可否将白螺交与赵文楷等供奉船舱，俾往返重洋得此灵物护持，自必益臻顺利……【朱批：】应令随往供奉，敬迓神恩。³⁴

因不清楚事件经过，玉德在其奏折中，将乾隆五十三年上谕所提到的两件右旋白螺混为一谈。实际上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前往台湾平定林爽文时所携带的右旋白螺，与乾隆五十三年底以后收藏在闽浙总督衙门的右旋白螺，并非同一件文物。前者今藏台北故宫，形制较大且装饰精美；后者由六世班禅进京时所进，尺寸较小，且并未饰以金银、宝石。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后者因频繁出借海疆官员出航使用，而为当时的士人所知。李鼎元在其《使琉球记》中，亦曾提到持这件右旋白螺前往琉球

34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嘉庆朝奏折》第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721。

的相关情况³⁵。道光十二年（1832年），台湾嘉义发生张丙等人所领导的民变事件，福州将军瑚松额（1772-1847年）奉命前往台湾钦差剿匪，亦曾携带这件六世班禅喇嘛所进的右旋白螺渡过台湾海峡³⁶。这件存放在闽浙总督衙门的右旋白螺，一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收缴大内³⁷。由此可见，自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到光绪二十九年，这件六世班禅喇嘛进献乾隆帝的右旋白螺，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佛教宇宙观，曾与清代后期百余年的官方航海活动息息相关。而这件右旋白螺以及佛教知识对清代官方航海活动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因为科学航海知识的崛起而被取代，从而回归清宫成为藏品。由此可见，作为佛教法器的右旋白螺，不仅曾被乾隆帝本人作为修习佛教密宗的法器，亦曾作为清代官员航海使用的定风珠。

五、结论

本文通过考察大黑天金像、清帝佛装唐卡以及右旋白螺，探讨清朝皇帝的宗教实践与政教观念。通过物质文化以及心态史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蒙藏佛教所倡导的政教二道观念，固然对清朝皇帝影响深远，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是将政治与宗教视为有机的结合，并非机械性地将宗教视为政治统治工具。也正因为如此，通过物质文化考察清官藏传佛教文物，可以发现其中富含许多关于清朝皇帝宗教心态的重要线索。尤其是乾隆帝曾经使用右旋白螺配合相关藏文梵咒，修习《时轮金刚续》以及《大威德金刚续》等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的甚深密法，并且将右旋白螺作为清代官员航海之用的定风珠。这些宗教实践主要是受到佛教宇宙观以及知识体系的影响，而非安抚蒙藏地区的政治宣传。由此可见，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在建构政教话语的同时，一方面亦深受佛教知识论的影响。换句话说，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将政治与宗教因素对立切割，而是应该将政治与宗教视为有机结合进行综合考察。而这也正是未来清史研究者之所以应重视清代多语种史料，同时结合物质文化与心态史研究视野，重新发掘清代中国政治、宗教以及文化多元性之关键所在。

◆ 孔令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历史学系双联项目博士候选人

35 李鼎元：《使琉球记》，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上海：著易堂，1897：176。

36 《清实录》第36册，《宣宗实录（四）》卷255，1986：366。

37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7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461。